

《国家和机构形象修辞研究》专栏主持人语

胡范铸

目标产生问题,问题选择方法。当代修辞学的根本目标是什么?应该是推动社会的发展。由此,随着中国与世界的互动的日益密切,中国国家形象的修辞问题也日益引起中国学术界包括修辞学界的关注,本刊为此曾先后编发过多篇论文加以讨论。而国家形象修辞研究的逻辑发展应该就是机构形象修辞学,因为在本质上,国家形象修辞只是机构形象修辞的一种特殊类型。这正是本期推出“国家和机构形象修辞研究”专栏的基本宗旨。

中国修辞学历来关注的主要是个人话语,而随着社会的日益现代化、信息化和全球化,随着社会公共生活重要性的不断凸显,机构话语的修辞也将越来越深刻地影响我们的生活,国家形象修辞研究需要进一步拓展,各个地区、各级国家权力机关、各种企业、各类团体的机构形象修辞问题更需要进入当代修辞学者的视野。而这一趋势可以说为中国当代修辞学的发展、为各地修辞学者的学术发展都提供了空前的机遇。

当然,这一情势也对当代修辞学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挑战。与个人话语交际不同,当代机构修辞是更与社会整体密切相关的修辞活动,是更注重“接受”、忌讳“自言自语”的修辞活动,也是需要面对巨量接受者的修辞活动。对这样的修辞过程,如何加以有效分析?本期发表的胡范铸等《“海量接受”下国家和机构形象修辞研究的方法设计——兼论构建“机构形象修辞学”和“实验修辞学”的可能》在明确提出“机构形象修辞学”的同时还提出了“实验修辞学”的设想;樊小玲的《国家形象修辞中的核心话语和支持性话语——基于 H7N9 与 SARS 时期官方媒体报道的分析》试图融合修辞结构概念与新“言语行为”分析讨论媒体的话语问题;白丽娜、周萍的《中国省区形象在西方网络世界的传播——以内蒙古为样本的多个语种的媒介调查》借助目标词前三网页研究考察机构形象修辞在网络海量信息中的“有效存在”。这些探索,也许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学”的根本价值原本就在于创造而非复述,思想的探索“当如野马不可如疲驴”。由此,希望有更多的学者能够加入这一创造过程。

“海量接受”下国家和机构形象修辞 研究的方法设计

——兼论构建“机构形象修辞学”和“实验修辞学”的可能*

胡范铸 陈佳璇 甘莅豪 周萍

(新疆师范大学中亚汉语国际教育研究中心,乌鲁木齐 830054;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
上海 200062 / 韩山师范学院中文系,广东潮州 521041 /
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上海 200241 /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上海 200241)

* 基金项目:本文为新疆“中亚汉语国际教育研究中心”重点项目“面向中亚五国跨文化交际案例库研究”(编号:040712B03),国家社科项目“突发事件政府应急话语技术与形象修复策略研究”(编号:13CXW040),广东省社科项目“面向潮汕籍华人的国际汉语教育策略:基于语言情感、文化认同、社会需求调查的分析”(编号:GD12XZW07)的阶段性成果。

提要 国家形象修辞应该说是机构形象修辞的一种特殊类型。修辞学历来关注的主要是个人话语,随着社会的日益现代化、信息化和全球化,机构话语的修辞将越来越深刻地影响社会生活,而这—趋势也势必将深刻制约中国当代修辞学的发展。目标产生问题,问题选择方法。中国修辞学包括机构形象修辞的根本目标是推动社会发展。在当代社会,修辞不仅仅是一个如何说的问题,甚至也不仅仅是如何“我说你听”的问题,而是“我”、“你”、“他”互动的过程,由此,机构形象修辞如何表达是重要的,但如何接受也许将更为重要。与个人话语交际不同,当代机构修辞的一大特点就是“海量接受”,面对的不是一个接受者,而是巨量接受者的集合。为了有效分析这一集合对于机构修辞的接受过程,实验修辞学研究将是一种重要的选择。实验修辞学就是运用调查、测试、计量、建模等自然科学、心理科学的方法研究修辞行为的理论与实践。这一新的课题,需要更多的方法探索和设计。由此,为了更有效地推进机构与机构、机构与社会的对话,我们以为,可以借助目标词频统计研究机构形象修辞的关注度,借助目标词共现分析研究机构形象修辞的语义价值,借助目标词前三网页研究考察机构形象修辞在网络海量信息中的有效存在,借助目标词自由联想测试研究机构形象修辞的目标接受者认知中的概念结构,借助目标词引文分析研究机构形象修辞的被转述率……由此,也许将有效克服机构形象修辞中最大的弊病“自言自语”。

关键词 国家形象修辞 机构形象修辞学 实验修辞学 海量接受 分析技术 目标词词频统计 目标词共现分析 目标词前三网页研究 目标词自由联想测试 目标词引文分析

国家形象修辞研究已日益成为中国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而如何研究、运用什么方法研究却很少有人关注。修辞学的科学化、修辞学研究方法的现代化曾经是一个非常热闹的话题,可是,是否只有引进西方语言学甚至只是引进西方语法学的种种术语和方法才是科学化?修辞学如何有效地进行方法探索?对此,似乎依然缺乏清晰的认识。

我们以为,一切研究范式都应该是目标、问题、方法的统一。什么样的目标就产生什么样的问题,而不同的问题则需要不同的方法去加以解决。

由此,我们便需要思考:

其一,国家形象修辞研究的根本目标是什么?是修辞现象的描写与解释?是修辞学的科学化?如果不是,那么是什么?为什么?

其二,国家形象修辞研究是否只是分析“如何说”的问题?只是分析新闻发布会如何发布国家形象广告的问题?如果不是,那是什么?合适的理论模型是什么?

其三,国家形象修辞研究是否就是一种纯粹的思辨过程?是否需要实验方法?如果需要,修辞研究如何运用实验方法?

一、机构形象修辞学:国家形象修辞研究的逻辑发展

中国修辞学研究历来以关注个人的话语研究为核心,无论是所谓文学语言的研究还是日常会话的分析,都是首先把话语作为一种个人行为的研究,即使是偶尔涉及所谓政治语言、法律语言,也往往是将之或者转化为一种个人的语言行为(如所谓毛泽东著作的语言风格),或者转化为一个一般意义上的语体学问题(如通常所谓公文语体研究)。

语言是社会互动最重要的媒介,而所谓社会互动并不只是发生于个人与个人之间,也发生于机构与机构之间、机构与个人之间。社会越是发展,机构与机构之间、机构与个人之间的话语互动就越是频繁而重要。当代修辞学必须对此加以足够的关注。

为此,我们先后(胡范铸 2002, 2003)提出了充分关注国家、政府言语行为的问题,继而(胡

范铸等 2010、2011)明确提出国家形象的传播与修辞的问题。今天,我们则需要进一步提出“机构形象修辞学”的问题。

所谓“机构形象修辞”,是指一个机构如何表达自己,以实现内部动员和外部认同的过程。这也可以说是一种“印象管理”的过程。在这里,政府部门是一种机构,企业是一种机构,学校是一种机构,社会团体是一种机构,国家其实也是一种机构。只是国家这一机构无论在体量上、复杂性上,还是在对于社会语言生活的影响上,都是一般机构无法比拟的。

国家是广义的机构的一种组织形式,而各种具体的机构可以说是国家的组成单元与细胞,没有省市区、县乡村、企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等机构的有效运转,现代国家的存在往往就是一种空洞的存在,而没有现代国家的统摄,所谓省市区、县乡村、企业单位、社会团体的机构在当今也将难以有效地存在与发展。

国家形象的有效修辞不但可以增加国家自身的话语效力,也将极大增加国家内各种机构的话语效力——信得过的德国制造的形象为德国企业增加了巨量的额外效益,便是例证;反之,一系列具体机构的话语失当,不但可能损坏该机构自身的形象,也完全可能损及这个国家的形象,当然也包括这个国家其他机构的形象。中国红十字会在“郭美美”面前的语无伦次损害的就不仅仅是中国红会本身,其实也损害了中国慈善事业乃至整个中国国家的形象。

由此,研究国家形象的修辞,必须同时关注省市形象的修辞,关注村镇形象的修辞,关注企业形象的修辞,关注学校形象的修辞,关注社会团体形象的修辞。

充分关注机构形象修辞学,这是发展当代修辞学的历史机遇,也是当代中国赋予当代修辞学的社会使命。

二、社会发展:国家和机构形象修辞研究的根本目的

国家形象的修辞已经越来越引起社会和学界的关注,机构形象的修辞也开始进入学界的视野,在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项目乃至不少省市的社科项目中,国家和机构形象修辞研究也已经获得越来越多的立项。

可是,国家形象修辞研究和机构形象修辞研究的根本目的是什么?对此,似乎依然缺乏有效的讨论。

国家形象修辞和机构形象修辞都是修辞活动的一个部分,讨论国家形象和机构形象修辞研究的根本目的,也许首先就需要重新认识什么是修辞研究的根本目的。

那么,修辞研究的根本目的是什么?

或曰,修辞研究的根本目的就是描写与解释修辞现象,则国家形象和机构形象修辞研究的根本目的当然也就是描写与解释国家和机构形象修辞现象。应该说,这一认识不是没有合理性,语言的研究离不开描写与解释,修辞研究同样如此。可是,描写与解释到底应该是修辞研究的根本目的还是说只是直接目的?即使是描写和解释修辞现象,科学哲学早已揭示,研究视域不同,现象也就不同,我们何以确定哪一种才是需要关注和重视的现象?

或曰,修辞研究就是研究如何有效地实现话语意图,则国家和机构形象修辞就是维护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机构的形象的修辞,国家和机构形象修辞研究就是研究如何有效地运用语言维护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机构的形象。应该说,这一认识也不是没有道理,但是,由此也可能带来一个问题,是否任何国家、任何机构的形象都必须运用语言加以维护?国家和机构的任何话语的有效性都要研究如何帮助其加以实现?

我们认为,一切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的根本目的都应该是促进社会的发展,修辞学亦然。在语言学的各相关学科中,如果说语音学可以相对超然地分析音位和音系,句法学不妨埋头于构式与语法化,那么修辞学却不同,他特别需要对社会的语言活动,尤其是重大的语言活动做出自己的回应,做出自己的解答。对于社会的发展,在中国语言学的各个分支学科中,修辞学无疑更具有当仁不让的义务。也就是说,修辞学的根本任务、国家形象修辞研究的根本任务、机构形象修辞研究的根本任务都应该是促进社会的发展而不仅仅是为了维护一个机构的形象,或者说是描写或者解释机构形象修辞的现象。

简言之,国家形象、机构形象和社会发展应该成为当代修辞学的核心问题。

三、新“言语行为”:国家与机构形象修辞研究的理论模型

何为修辞?在很多人看来,这就是一个说话如何艺术化的问题。由此,在国家形象修辞研究中,有不少人以为,这就是国家如何发布新闻、国家如何发布广告等等的问题。

其实不然。

如果说个人话语的修辞也许在某些特定条件下还可以表现出一定的“自言自语”——尽管自言自语也是一种对话,是一个自我与另外一个自我的对话,那么,国家形象和机构形象的修辞则一定不仅仅是自己如何说的问题。

传统以为,所谓修辞就是“一个人如何说话”的问题,亦即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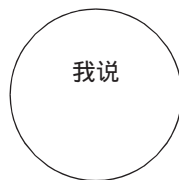


图1:一个人说

近年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修辞学其实是一种“我说你听”的过程,亦即如图2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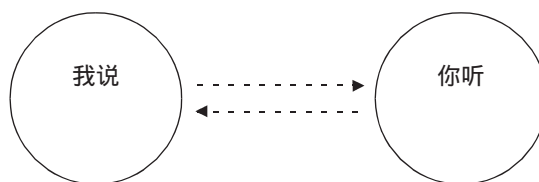


图2:我说你听

我们则要指出:所谓言语行为,就是某言语主体在一定的人际框架和语境中,根据自己的意图,组织并发出一段话语,另外的言语主体接受到这一话语并作出有关联的响应的游戏。这里的“人际框架”应同时包含“我”、“你”、“他”。

由此,一个言语行为不仅仅是“我说”,甚至也不仅仅是“我说你听”,而是一个“我”、“你”、“他”三方行为主体、“叙述”、“接受”、“核查”、“驱动”四种话语角色互动的过程。

也就是说,在这里,言语行为的主体不仅仅是“我”和“你”,还有“他”,在通常情况下“我”是

话语的叙述者(说话者)和驱动者(话语动机的提供者)，“你”是听话者，“他”则是核查者；任何言语行为都是叙述、接受、核查、驱动的同时作用，不过，这四种角色互相缠绕、转化，即使说的本身，也已经蕴含了四种行为：自驱、自言、自听、自控。如图3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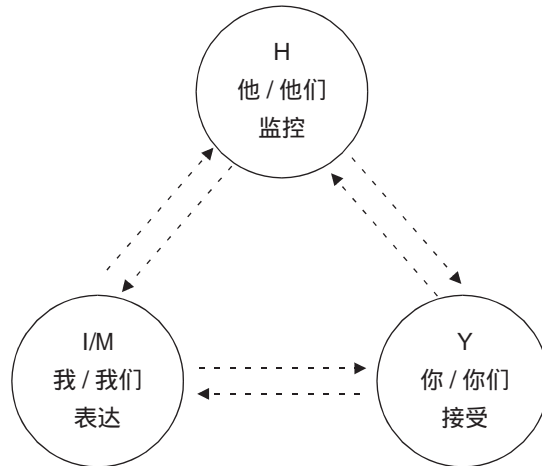


图3:我、你、他互动

在这里，没有有效的说就没有有效的听，没有有效的听也就没有有效的控，而没有有效的控就没有有效的说。

在这里，是否具有“他者”意识也就是核查者意识可以说是现代言语行为与前现代言语行为的根本性区别，是“言语行为的现代性”的基本标记之一。

进而言之，这种互动使得任何一个主体的意义都发生了变化。就第一人称而言，“我”有I与me的分别，亦即主我和宾我的分别。所谓“宾我”，亦即“我这个主体在与其他主体发生互动的过程中，把他们对我的期望内在化的结果”，即米德(G.H.Mead)所说的“一个人自己采取的诸多他人的态度的系统组合”(转引自童世骏《没有“主体间性”就没有规则——论哈贝马斯的规则观》，载《复旦学报》2002年第5期)。其它人称亦然，都有一个自我和把诸多他人的态度的系统组合的过程，有一个把他们对自我的期望内在化的过程。

也就是说，言语行为主体不仅仅是意味着“我”，意味着“我”、“你”、“他”的三种主体性，更意味着一种主体间性，亦即多重主体之间关系的互动和转化。(胡范铸2009) 国家形象修辞只有经过接受者的转述——无论是内心的转述还是话语的转述，才可能成为有效的“合意”的转述。

由此，国家形象修辞和机构形象修辞研究不但需要分析“我们”怎么说，更要研究“你们”(目标听话者)和“他们”(非目标听话者)怎么听，是否有兴趣听，是否听见；不但需要研究怎么听，更要研究听后会怎么说，还要研究听者为什么会这样听，为什么会这样理解，为什么听后会这样说；此外，也要研究说者是否听到听者的回声对于“说”的意义。

这样，就带来一系列的问题：

——我们国家形象的修辞，要有效地说，就必须分析：国外社会是否听得见？

——我们国家形象的修辞在西方社会常常需要经过当地大众媒体的转述，则西方国外的媒体听见以后是否转述？如何转述？国外媒体转述以后他们的受众如何反应？

——现代最重要的媒体无疑是网络,中国国家形象、中国的机构形象在西方社会的网络是如何传播的,如何分析?

——网络时代的接受是一种由几乎无限量的接受者构成的接受,则其中的接受者的态度是否是冲突的?如果是冲突的,如何加以描写?

——任何接受都不是一种被动接受的过程,都是以某种既有的视界甚至是刻板印象去改造新信息的过程,则有效的修辞尤其是国家和机构形象的修辞如何才能发现接受者固有的刻板印象,有效分析受众认知的概念结构?

——在某一言语社区(国家、民族、地区)中,特定受众刻板印象形成的最重要的动因是学校教育,则要分析一个国家形象修辞在某一言语社区中的传播,是否就应该充分关注该社区的教材中关于某国的国家形象的叙事?

——国家形象修辞是一种言语行为,而这一言语行为既是句子的,也是语块的、语篇的,更是超语篇的,则如何才能有效地分析超语篇的言语行为结构?

——在国家和机构形象的印象管理中,并非所有的刻板印象都必须、都应该加以改变,国家和机构形象修辞研究的目标就在于如何建设一种有利于社会发展的刻板印象,则如何才能有效分析在受众中某种形象的美誉度或者恶评度?

……

四、“海量接受”：实验修辞学的根本动因

目标产生问题,问题选择方法。

中国修辞学多年以来不但缺乏对于研究目标的自觉、研究问题的自觉,也缺乏对于研究方法的自觉。我们以为,中国修辞学不仅仅是一个关注语言运用问题的学科,更应该是一个推动语言生活发展的学科。而推动语言生活的发展,自然不但需要运用很多现成的方法,更需要从其他学科借鉴乃至直接发明一系列的方法。

西方修辞学是从哲学中分化出来的,21世纪初的哲学则出现了新的分支:实验哲学。在实验哲学研究者看来,传统的哲学研究是一种“扶手椅哲学”,依赖先验的概念分析,通过思辨和调动直觉上的反应来进行哲学研究。而实验哲学则是运用社会科学的问卷调查、心理测量、统计分析等实验方法,甚至采用自然科学的认知实验技术和计算机建模方法来研究与哲学有关的问题,由此“去了解不同的人群对于诸如“知道”、“故意”、“自由”、“责任”等基本概念的看法,以及形成这些判断的认知和神经机制,从而将哲学研究建立在更为坚实的经验基础之上。

那么,修辞学是否也可以并且需要运用实验方法呢?

修辞学曾经只关注表达,后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修辞的接受问题,可是这种关注往往还是以个人体验分析为主。如果说日常语言的表达首先是一种个体的行为,运用个体的体悟去加以解析,不但是可行的,也许还是必须的,但是,一旦进入接受的研究,就意味着这不仅仅是一个个体的问题,而更多地成为一种群体或者是个体的集合的问题,而对于群体的分析,仅仅凭借研究者个体的体悟显然是不够的。这就无疑需要新的方法的介入。

至于国家形象修辞和机构形象修辞,更是一个需要面对众多乃至海量接受者的问题。

依一般统计,中国已然成为世界上经济总量第二的国家,中国的声音越来越引起世界的关注,中国国家话语包括机构话语的关注者遍布世界各国、各阶层、各个利益群体。而这些国家、阶层、利益群体的利益诉求、兴趣偏好又是如此纷繁复杂甚至彼此对立。如:

(1)a 对于中国政府的声明,皮特先生表示理解。

b 对于中国政府的声明,皮特和他的好友都表示理解。

?c 对于中国政府的声明,欧洲人都表示理解。

对于某一话语,我们也许可以说“某人听到以后非常认同”,但是,我们却不能够简单说“某国人听到以后非常认同”——尽管新闻中常常有类似的表述——因为“某国人”的态度是一个多样性的集合。

对于如此复杂的海量接受的分析,如果只用个体语料举例的方法,只用个案分析的方法,只用个体体悟的方法显然是有很大局限的。

大数据时代的修辞需要新的方法,修辞产生的大数据需要新的方法。由此,“实验修辞学”便成为一种不可忽略的选择。

所谓实验修辞学,就是运用调查、测试、计量、建模等自然科学、心理科学的方法研究修辞行为的理论与实践。

我们曾经运用小型田野调查的方法,分析“非典”期间广州卫生局新闻发布会的可信度。由此,不但揭示“所谓谎言,并不等于‘不合乎事实的话语’”,更提出“实话如何实说”的问题,不懂得“实话”如何“实说”,将极大影响政府信息发布的可信度。(胡范铸 2003)

我们也曾经对中国井冈山地区的标语口号、对上海某社区的标语口号等等进行调查,分析了“地区和他的居民,地区和外来者在公共空间对话”存在的一系列问题。(胡范铸、聂桂兰、陈佳璇、张佳 2004,聂桂兰 2004,张佳、陈瑶 2004)

我们(陈佳璇、胡范铸 2010)还曾经运用对“犯罪嫌疑人”、“嫌疑人”、“嫌犯”的社会认知问卷调查的方法,分析了“看守所在押人员的身份指称问题”,揭示尽管在国家和机构的话语中,均已认可“未经法庭判决,一切人都不得被认为有罪”的原则,但在立法、司法甚至法学家的潜意识中,依然倾向于认为一旦被关进拘留所就是“犯人”。

这里,根据国家形象修辞和机构形象修辞的特征,我们将讨论一系列新的分析方法和技术的可能:

一是,目标词词频统计法——当今是信息时代,更是大数据时代,绝大多数信息基本上是一种“随风潜入夜”的过程,来无踪,去无声,似乎从来没有出现过。在大数据时代,国家形象的有效修辞、机构形象的有效修辞,首先就需要社会给予国家或者机构发布的话语给予关注,没有关注度的任何话语,都接近于无意义。最糟糕的广告——或者说至少是“次最糟糕”的广告是花费了巨量广告费而目标接受者却根本没有注意到的广告。而要分析一个国家或一个机构话语的“关注度”,就可以采用“目标词词频统计法”。如统计《纽约时报》几十年来“中国经济”一词词频的变化,就可以有效说明美国主流媒体对中国经济关注度的变化,分析其关注偏好的变化。

二是,目标词共现分析法——语料库语言学把生语料加工成熟语料时,其中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标注词性、短语类型、句式等,不过这种加工首先是为句法语义研究服务的。其实,在国家形象修辞研究中,我们也可以利用短语的特质加以统计和分析。如联合短语都是由语法功能相当的成分并列构成的,这是一个比较简单明确的认识,如“京津沪”、“中美日”、“欧洲和亚洲”,但是,从修辞的角度看,联合短语的构成成分不但在语法性质上是相当的,在语义价值上也更应该是相当的——除非是在叙述敌对状态、冲突状态等情况下。如有“地富反坏”,有“地富反坏右”,却没有“地富反坏商”,因为“商人”的语用价值与“地富反坏”不能并列。由此,我们

也许可以利用这一特性测量某国家、某机构在一种言语社区中的基本形象。如一个国家到底通常是与什么国家一起出现,与其共现的国家都是什么类型?如与之共现的常常是“无赖国家”,则这一国家形象修辞在那一言语社区中一定相当糟糕;如与之共现的常常是“发达国家”、“民主国家”,则这一国家的形象修辞在那一言语社区中就比较成功。

三是,目标词前三网页研究法——21世纪是网络世纪,最重要的传播媒体就是网络,“失网络者失天下”。而网络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信息的超巨量,我们曾以“中国”为目标词在上海检索谷歌,得到的数据是645000000条,没有任何人可能阅读其中的哪怕百分之一,即使是以“复旦”为目标词在上海检索谷歌,得到的数据也有47000000条,也没有任何人阅读其中的百分之一——而这其实通常还不包括被过滤掉的数据。由此,网络数据的传播与接收其实存在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即“三页后基本死亡律”:读者对一个目标词的检索结果通常只关注前三页,后面的几乎不会加以阅读,越是公共的命题,越是海量的数据,就越是容易出现“三页以后死亡”即无人关注的现象。由此,我们分析国家形象修辞的接受,分析机构形象修辞的接受,就不能不注意这一特征,密切关注目标词在网络前三页中的“有效存在”。

四是,目标词自由联想测试法——国家形象修辞、机构形象修辞既然是一个“我、你、他”互动的过程,就必须关注“我”(说话者)说什么、怎么说,必须关注“你”(目标接受者)会怎么听、听后会怎么说,关注“他”(非目标接受者/监督者)会怎么看。这就需要分析接受者的认知,尤其需要分析接受者认知中的“刻板印象”——对于某一事物比较稳定的看法。如接受者倾向于认为这是一个“没有法治,罪犯横行”的地区,则这个地区企图通过宣传自己的“风景如画”来获得大量游客就可能是一种笑话。那么,如何才能有效地揭示目标接受者认知中的刻板印象或者说“概念结构”,似乎可以采用“目标词自由联想测试法”。对于受试者运用目标词与非目标词混合后进行测试的方法,不但可以揭示问卷调查难以发现的概念结构,甚至可以发现连受试者自己也未察觉的认知状况。

五是,目标词引文分析法——任何话语、任何言说者都有一定的倾向。在某一言语社区中,对某一主体、对某一命题引用得越多,被转述度越高,在一般情况下就意味着该主体、该命题获得更高的信赖度。如在西方某言语社区(网络论坛、主流报刊)中检索“中国”一词,获得数据的引文很少是中国媒体提供的,这意味着我们媒体的所谓对外宣传基本上还是一种自言自语。

……

其实,可以运用的实验方法还有很多,比如,我们是否可以运用对偏正结构中修饰性成分的分析来研究一个机构的美誉度/恶评度?我们是否可以通过对键盘输入的分析来研究国家或者机构形象修辞?

五、结 语

国家形象修辞应该说是机构形象修辞的一种特殊类型。修辞学历来关注的主要是个人话语,社会越是发展,修辞研究越是需要从对个人与个人话语活动的关注转向机构与机构、机构与个人话语活动的关注。

随着社会的日益现代化、信息化和全球化,机构话语的修辞将越来越深刻地影响社会生活,而这一趋势也必将深刻制约中国当代修辞学的发展。

目标产生问题,问题选择方法。中国修辞学包括机构形象修辞的根本目标是推动社会发

展。修辞不仅仅是一个如何说的问题,甚至也不仅仅是如何“我说你听”的问题,而是“我”、“你”、“他”互动的过程,在这里,机构形象修辞如何表达是重要的,但如何接受也许将更为重要。与个人话语交际不同,机构对机构、机构对个人话语活动是一种群体性的或者是个体的集合性的活动,产生的数据将不再是仅仅凭借个人的体悟就可以充分而有效分析的,网络时代的数据传播方式更是使得任何话语都可能被海量信息淹没。

当代机构形象修辞的一大特点就是海量接受,面对的不是一个接受者,而是巨量接受者的集合。为了有效分析这一集合对机构形象修辞的接受过程,实验修辞学将是一种重要的选择。所谓实验修辞学,就是运用调查、测试、计量、建模等自然科学、心理科学的方法研究修辞行为的理论与实践。实验修辞学是修辞学的一种新的课题,需要更多的方法探索和设计。为了更有效地推进机构与机构、机构与社会的对话,我们以为,可以借助目标词词频统计研究机构形象修辞的关注度,借助目标词共现分析研究机构形象修辞的语义价值,借助目标词前三网页研究考察机构形象修辞在网络海量信息中的有效存在,借助目标词自由联想测试研究机构形象修辞的目标接受者认知中的概念结构,借助目标词引文分析研究机构形象修辞的被转述率……

由此,也许将有效克服国家和机构形象修辞中最大的弊病:自言自语。

注 释

- ①2001年,温伯格等人《规范性和认识论直觉》的发表,被认为是实验哲学诞生的标志。从此,对哲学和行为科学(主要是心理学和认知神经科学)进行交叉研究,日渐为学界所关注(参见约书亚·诺布等《实验哲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国内也已有高校设立了哲学实验室(张清俐、谢方《哲学家可以像科学家那样做实验吗?》,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6月26日)。
- ②我们认为所谓中国经济总量已达世界第二,更多地是某一种统计方法的结果,并不等于经济实力已经居于世界第二。可以说,这也是一种“修辞”。
- ③白丽娜、周萍《中国省区形象在西方网络世界的传播——以内蒙古为样本的多个语种的媒介调查》(《当代修辞学》2013年第4期)。

参与文献

- 胡范铸 2002 突发危机管理的一个语用分析——兼论语言学的研究视界[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年第6期.
- 胡范铸 2003 实话如何实说:突发公共安全危机管理中的政府信息发布——危机管理的语用分析之二 [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第6期.
- 胡范铸、聂桂兰、陈佳璇、张 佳 2004 中国户外标语口号研究的问题、目标与方法[J].《修辞学习》第6期.
- 张 佳、陈 瑶 2004 如何“让社区更美好”——上海曹杨地区标语口号调研[J].《修辞学习》第6期.
- 聂桂兰 2004 标语口号:劝说和宣告功能丧失之后——江西吉安乡村“过期”标语口号的调查[J].《修辞学习》第6期.
- 胡范铸 2009 言语主体:一个语用范畴的日常语言分析[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第6期.
- 胡范铸、薛 笙 2010 作为修辞问题的国家形象传播[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第6期.
- 陈佳璇、胡范铸 2010 指称、事实、观念——看守所在押者身份称谓的社会认知语言学分析[J].《华东政法大学学报》第1期.
- 陈佳璇、崔蓬克、胡范铸 2011 言者身份与修辞力量:国家形象修辞分析中的一个问题[J].《当代修辞学》第2期.